

关于杜甫的政治倾向问题

吴明贤

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一位著名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今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弄清杜甫的政治倾向，正确评价杜甫及其诗歌创作，对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有着一定的帮助和借鉴。

杜甫生活于唐代社会从尊法到崇儒、由兴盛而衰落的历史转变时期。路线的逆转，导致了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的空前尖锐。存在决定意识。在这个历史大转变的激流中，杜甫的世界观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他始终怀着“致君尧舜上”^①的政治理想，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他又特别欣赏贞观、开元之治，并从中受到了一些具体影响。但是这“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纵观杜甫的一生，严重的儒家思想始终是他政治倾向的主要方面。正是因为这种严重的儒家思想，不仅阻碍了他的诗歌创作，使他的诗歌缺乏路线的鲜明性和斗争的尖锐性；而且影响了他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上的认识。由于方向不清，因而往往站到了大地主阶级一边，起到了帮助他们维护反动统治的作用。

主张“仁政”“德治”，反对变法革新。杜甫对当时统治阶级弃法任儒，实行反动统治所引起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认为“周室宜中兴，孔门应未弃”，只有用儒家的“德治”“仁政”才能改变现状，使唐王朝“中兴”；极力主张唐统治者效法文王，“兼周礼”，“体仁恕”，用“德教”治理国家。而劳动人民则要象“鸿雁”和“羔羊”一样“行飞”、“乳跪”、“识序”、“知恩”，对于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俯首贴耳，“有若奉至尊”，决不能违反“太古之礼”。只有从上到下，“君臣重修德”，才能“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达到国泰民安的“仁德”境地。因此他攻击“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反对象商鞅那样实行变法革新。当时为了支持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刘晏、第五琦等进行财政改革，实行榷盐法，搞盐铁官营，杜甫却认为“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阗”，诬之为与民争利；并且说什么“任转江淮粟，休添苑囿兵”，把刘晏均节赋敛，运转江淮米调剂关中（实际上是为平定“安史之乱”筹粮）的正确措施说成是还不如精简压缩军队。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激烈进行的情况下，这不能不是一种腐儒式的荒唐见解。从这种“仁政”“德治”出发，杜甫颠倒是非，认为太宗、武后

时期的繁荣兴盛是因为“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是实行“德治”“仁政”的结果，错误地把贞观到开元时期推行的法家路线涂上了一层儒家的色彩，而把开元以后推行儒家路线造成的政治腐败归咎于未能实行“德治”和“仁政”上。这说明尽管杜甫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不满，然而却找不到一条出路；尽管对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揭露，然而却割不断和他们的联系，划不清和他们所推行的那条儒家路线的界限。

主张“授钺亲贤”，鼓吹分封诸王。杜甫世界观中严重的儒家影响，使他的诗歌中充斥着复古守旧的倒退思想，忆古追昔的诗句比比皆是。唐尧虞舜、文王周公是他心目中十全十美、“德尊一代”的圣君贤相。至于西周的奴隶制社会，更是被他美化为十足的“天堂”。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他甚至主张“上请减甲兵，下请安井田”，幻想重行井田制。“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虽然反对藩镇割据，然而却追随儒生房琯支持要玄宗分封诸王以应付局面的建议，而且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广德元年他在《有感》一诗中用丹桂喻唐王朝，以青梧比皇室，认为“丹桂风霜急，青梧日夜凋”，唐王朝的不安定是由于皇室的削弱。因此他鼓吹“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终依古封建，岂独听萧韶”，只要实行“古封建”，藩镇割据势力就会自然臣服，听从号令，不仅能听到优美的韶乐，满足他“元听舜日旧萧韶”的愿望，而且可以实现象西周奴隶制那样的“太平盛世”。同年他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再一次鼓吹只有效法古代“维城磐石之义”，“以亲贤出镇”，“以亲贤总戎”，“以亲王委之节钺”，才能“根固流长”，收到“万世之利”的效果。实际上这是要封建君主根据儒家任人唯亲的原则，将皇子宗族派到各地去做世袭的藩王，用另一种形式的分裂割据去代替藩镇节度的分裂割据，重复汉初用同姓王反对异姓王的老路。如果说在汉初这已经是一种错误方针的话，那么在封建社会已经历千年以后的唐代，这种建议无疑更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措施了。因此它一出笼就立即受到了和杜甫同时代的刘晏的坚决反对，史载刘晏“移书房琯，论封建与古异，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②。比杜甫稍后的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中也有力地抨击了这一倒退论调。事实上，当时玄宗也听从了房琯的建议，分封了李亨和李璘。但结果如何呢？不久李亨便在灵武自立为帝，取玄宗而代之；而在长江流域的李璘，也和当了皇帝的李亨大打出手，害得当时跟着他的李白也倒了大霉。这说明杜甫“终依古封建”的措施不仅不能起到夹辅王室、巩固中央集权的作用，恰恰相反，而是为新的分裂割据开辟了道路，这是杜甫始料不及的。

宣扬愚忠思想，美化封建帝王。愚忠思想是杜甫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君主歌功颂德、力图效忠的句子充塞着杜甫的整个诗篇。尽管玄宗、肃宗、代宗都是软弱无能的昏君，然而杜甫却肉麻地吹捧为“圣人”、“明主”，比之为“北辰”、“太阳”，并为他们穷奢极欲的享乐腐化生活进行辩护和开脱，胡说“圣人筐筐恩，实欲邦国活”，政治腐败只是因为大臣中缺乏“仁者”，而多“奸吏”、“黠吏”之徒。杜甫一生中无论流浪迁徙，还是做官定居，总是念念不忘朝廷，时时想着君王。“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恩答圣朝”，“恋阙丹心破，霏衣皓首啼”，“众流归海意，万国捧军心”，“意内称长短，

终身荷圣情”等句子，俯拾皆是。对君主肝脑涂地、赴汤蹈火的一副奴才相真是跃然纸上，无以复加了。甚至到了晚年，自己虽已多次碰壁，然而“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这种愚忠思想都一点没有改变，甚至还以此勉励别人。真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了。看来苏轼特别称赞他“每饭未尝忘君”^⑩，是很有道理的。必须指出，我们并不一概否定君权思想。历史上法家人物都往往主张尊君，韩非主张“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李斯也强调要“别黑白而定于一尊”。但是，他们所尊的是那些能够执行法家进步路线的君，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这和杜甫不辨路线，不分好坏，凡是君主都一律加以拥护的愚忠有着根本的区别。正是因为杜甫有着这种愚忠思想，因此尽管他看到大地主阶级的反动腐朽，然而却始终对他们寄予希望。

维护封建礼教，鼓吹“三纲五常”。杜甫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特别对“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奉为信条，大肆加以鼓吹。他在《牵牛织女》一诗中写道：“嗟汝贫家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要妇女严格遵守儒家的清规戒律，整天关在闺阁绣楼里诚惶诚恐，拼命克制自己，进行自我修养，切忌跨入社会的广阔天地。并竭力鼓吹“明明君臣契”，要把这种夫妇之义推而广之，通于君臣之道。他的《新婚别》也流露出了“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什么“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什么“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完全是孔老二“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翻版。杜甫宣扬“同姓古所敦”，“孝理敦国政”，强调要加强宗族观念，用“孝”来治理国家。认为“自古存忠孝”，只有做到“委曲承颜体（指孝），鸢飞报主恩（指忠）”，才能“双飞获麒麟”，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所以他十分赞扬孟氏“承颜胼手足”，能尽“孝道”；特别羡慕卫伯玉忠孝两全，母子均得加封大官。杜甫讲“仁”，和孟轲一样，认为“恻隐仁者心”，因此他讨厌鸡食虫蚁，伤生害命，要奴仆捉去卖掉。但当他看到“鸡被缚急相喧噪”，想到卖了以后仍不免“还遭烹”的时候，心中不忍，又“叱奴解其缚”。这和孟轲“君子远庖厨”的虚伪说教毫无区别。杜甫讲“义”，特别对那个帮助苍鹰报仇雪恨的健鹤备加吹捧，认为是“义”的样板。其实正如后来的有些注家所说，所谓“义鹤”不过是聂政、荆轲一类为别人收买的亡命之徒和跳梁小丑罢了。杜甫讲“礼”，实际上就是要人们象雁、羊等动物那样，识序知恩，遵守封建秩序。杜甫讲“智”，就是要人们走孔老二“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所谓“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他教育儿子“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要他苦读儒家经典，成为象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曾参、子游、子夏那样升堂入室的高才“达者”。杜甫还讲“信”，然而却不过是“忠”与“义”的别名而已。

信奉儒家“天命”，陷入佛道深渊。杜甫严重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基础上的。如果说杜甫在“饮酣视八极”，“嫉恶怀刚肠”，对未来充满朝气的青年时期，曾经发出过“自断此生休问天”的豪言的话，那末这种豪言毕竟是异常脆弱的，在现实生活的激流中，很快就被撞得粉碎，而被儒家的唯心主义“天命观”所代替了。什么“百年赋命定”，“有客虽安命”，什么“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等等，不一而足。从这种“天命观”出发，他认为“畿归龙凤质”，李姓王朝是奉天之命进

行统治的，不管是好是坏，只能对之诚惶诚恐；他宣扬“五陵佳气”，吹捧“高帝子孙尽龙准，龙种自与常人殊”，因此应该分封诸王，做到“元帅归龙种”，用同姓王代替藩镇节度。到了晚年，他就只能发出“宿昔世安命，自私犹畏天”这种微弱的呼声；哀叹“衰老悲人世”，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情绪；甚至鼓吹“积善”行德，堕入佛道因果轮回的宿命论深渊中去了。

杜甫世界观中这种严重的儒家思想糟粕，使他的诗歌创作处处表现出“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尽管他看到了大地主阶级统治的腐朽，但总是自怨自艾，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悲哀。在他的诗中，劝说与乞求多于揭露与抨击，感慨与惋惜多于愤怒与诅咒，当然更不可能穷根究底追查造成这种腐朽状况的原因。这就大大地削弱了他诗歌中仅有的一点战斗性，同时对后代诗人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二

杜甫矛盾着的世界观中，严重的儒家思想支配了他的政治立场，制约着他的诗歌创作，这是主要方面。然而，这并不排斥杜甫世界观中也有冲破儒家思想束缚的政治成分。杜甫的诗歌所以能成为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而取得较高的成就，正是因为有这种进步的成分作为他诗歌积极内容的重要思想基础。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杜甫的诗歌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大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尖锐的矛盾。以李林甫、杨国忠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只知“媚事左右，迎合上意”，“妬贤嫉能，排抑胜己”，“杜绝言路”，“屡犯大狱”^④，是一伙极端反动腐朽的政治势力。杜甫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他们一伙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刻划描绘和深刻辛辣的揭露讽刺。“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他们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过着骄奢淫逸、纸醉金迷的寄生生活；而且“攀龙附凤势莫当”，“炙手可热势绝伦”，一个个专横跋扈，气焰熏天，权势逼人。杜甫进一步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他们穷奢极欲的享乐腐化，正是建筑在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因而也就造成了贫富的尖锐对立，加深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种阶级对立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长期战争，人民负担加重，加之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广大劳动人民更是被迫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形成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⑤的悲惨景象。“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已诉征求贫到骨，尚思戎马泪盈襟”，以及杜甫的《三吏》、《三别》等著名诗篇，就形象地描绘了这一时期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和痛苦生活。“安史之乱”平定后，“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苛捐杂税仍然十分繁重，劳动人民的境况丝毫没有改善；“高官达马厌酒肉，此辈（指老百姓）杼柚茅茨空”，阶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杜甫诗歌中这种对大地主阶级的揭露正是对当时统治者推行儒家路线造成的各种恶果所表示的不满，尽管杜

甫并没有从路线上去认识这些问题，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一定的暴露作用。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杜甫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当然不可能在他的诗歌中同情和支持这种反抗斗争，但我们从他“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风。幽蓟已削平，荒徼尚弯弓”，“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⑥，“久阴蛟螭出，盗贼复几许。……群盗下辟山（按：即今四川璧山县，唐时属渝州），总戎备强敌”等诗句以及《同元史君春陵行》等诗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的侧影。

由于玄宗后期倒行逆施，推行反动的儒家路线，重用世家豪族，宠任边将藩镇，因而削弱了中央集权，使得藩镇割据势力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把唐代社会拖入了黑暗的深渊。在统一和分裂的问题上，杜甫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杜甫在《后出塞》中就指出：“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座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对即将爆发的“安史之乱”表示忧虑，向当权的统治者发出了警告。“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又积极主张平定叛乱，“吾将罪真宰，意欲铲迭嶂”，表示了要消除分裂割据的强烈愿望。“安史之乱”平定后，唐王朝统治者软弱无能，对安史旧部采取了姑息妥协的方针。各地将帅也争相趋奉，拥兵自重，割据叛乱，不断发生。唐王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重镇如割据，轻权失纪纲”，“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幽州余蛇豕，乾坤尚虎狼”等就生动形象地高度概括了当时的这种形势。杜甫对此表示不满，热望国家统一。“秦王拔乱姿，一剑息兵符”，他高度赞扬太宗时期的统一集权，就是这种愿望的生动体现。然而如上所述，杜甫虽希望统一，但却把实现这种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大地主阶级实行“仁政”和“德治”上；他反对藩镇割据，却又妄图走“终依古封建”的老路。这不能不说明儒家思想严重地束缚着杜甫的世界观，因而使他并不能真正找到一条实现统一的有效措施，相反却走上了错误的死胡同。

唐王朝弃法任儒的转变，使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安史之乱”前，唐玄宗破坏了唐初以来和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的友好政策，穷兵黩武，大事征伐，对吐蕃、契丹、南诏等少数民族连年进行战争，实行民族压迫，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然而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王朝国力的削弱，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上层统治者却趁机向唐王朝发动侵扰。特别是吐蕃，不仅夺取了凤翔、邠州一带的广大地区，而且一度攻占长安和四川西北的松维保三州，给当地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杜甫的诗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这种形势。他在《后出塞》、《遣怀》和《兵车行》等诗中，谴责了唐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欺凌掠夺，指出正是在这种“百万攻一城”、“尺土负百夫”和“猷捷日继踵”的情况下，不仅恶化了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深了与少数民族的隔阂和矛盾，而且导致了藩镇割据势力的分裂战争。他又在《释闷》、《巴山》、《岁暮》和《伤春五首》等诗中表示反对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对汉民族的侵扰破坏；并在“天地日流血，朝庭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等诗中抒发了他忧国伤时的愤激心情。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杜甫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属于中小地主阶层，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唐代的所谓“开元盛世”，当时的玄宗尚能励精图治，基本上继承了太宗、武

后那条进步的法家路线，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这种情况使当时的杜甫对前途充满信心，“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颇有一番济世安民的政治抱负。但是，当他三十五岁入长安开始仕途生活的时候，世家大族已经上台开始推行儒家路线了。在大地主阶级的统治下，杜甫不但在政治上连遭失败，而且在生活上也是每况愈下。特别在“安史之乱”发生后，他“生涯似众人”，“老逐众人臣”，被迫失去了安定的生活，跟着流亡的难民四处奔波，寓居各地。“野果充饥粮，卑枝成屋椽”，“罗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虽然未免言过其实，但生活比较贫寒窘迫却是事实了。正是这种情况使杜甫有机会能够和劳动人民进行接触，对他们的苦难生活有所了解，对造成这种恶果的大地主阶级有所认识，因而能够“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发出了“谁能叩君门，下令免征赋”的感慨；并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现实，“丈夫死百役”，“刻薄及锥刀”，对大地主阶级的腐朽奢侈有所揭露。再把这种国势日衰的情景和贞观、开元时期进行对比，他的思想上不能不对唐初一百多年的政治产生怀念，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开元之治”留下深刻的印象。“本朝再封建，未及贞观时”，“武德开元际，苍生岂重攀”，“切切开元事，分明在眼前”，“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等诗句，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流露。这说明杜甫虽然始终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的儒家政治理想，也没有从法家观点去认识唐初一百多年的政治路线，但事实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法家路线的某些影响，因而能够使自己的世界观中也有冲破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这就是杜甫能够比较真实地揭露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产生希望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思想的重要原因。

必须指出，杜甫一生虽然很长时间过着比较贫窘的流浪生活，但“生常免租税，名不逮征伐”，始终没有丧失中小地主阶级的地位。因而他一方面对劳动人民进行“劝其死王命，慎勿违奋飞”的顺民说教；另一方面又对那些敢于革命，勇于造反的劳动人民充满着仇恨。所谓“败亡非赤壁，奔走为黄巾”，不但把农民起义和当时的军阀割据混战等同起来，加以反对；“赤眉犹世乱，青眼只途穷”，并且认为西山地区的山民（杜甫称之为“山贼”）起义就和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一样是造成“世乱”的根源。当江南地区袁晃农民起义发生后，他就要“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坚决主张洗荡和镇压了。为了避免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杜甫一方面提醒唐朝统治者吸取“纷纷为白马，攘攘著黄巾”即东汉末年任用宦官引起黄巾起义的教训，不要重蹈复辙；另一方面还要统治者随时注意人民的动向，防患于未然，认为“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由此可见，杜甫的阶级壁垒是十分森严的。那种认为杜甫只主张对人民加恩，不主张对人民镇压的看法，不过是“人民诗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完全模糊了阶级界限，是完全错误的。

三

杜甫生长在一个封建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立下了“致君尧舜上”的儒家政治理想，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往往离不开一个“儒”字，什么

“醇儒”、“硕儒”、“巨儒”、“腐儒”、“儒生”、“儒士”、“儒衣”、“儒冠”等等，或褒或贬，或扬或抑，应有尽有，比比皆是，总共约有五十处之多（此处据《杜诗镜铨》）。毛主席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为了透过杜甫对“儒”褒扬贬抑的现象，认清他世界观的真正实质，我们只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一下杜甫诗中的“儒”，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杜甫在夸耀自己是“圣人之后，世食旧德”的高贵出身时，总是以“儒”自豪的。他自鸣得意地说：“吾祖也，……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把“仁义礼智信”等反动的儒家思想看作是他的传家宝，把“奉儒”作为自己祖传不衰的“素业”。因而他“不敢忘本，不敢违仁”，丝毫不敢忘记儒术这个安身立命的根本，时刻不敢背叛儒家“仁政”的说教。可见杜甫从小对儒学就是十分崇拜的。儒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在《敬赠族弟唐十八使君》中写道：“鸾凤有铙翻，先儒曾抱麟”，把自己的祖先比做剪羽的凤凰和抱麟的孔丘。他常常夸耀“诗是吾家事”，甚至吹嘘他“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从小学诗做文都要以儒家典籍为依据。当他获得了一个左拾遗的小官的时候，受宠若惊，喜不自胜，认为“此生遭圣代，……蒙恩早厕儒”，可以继承“奉儒守官”的“素业”了。这说明杜甫尽管经历了唐代社会的急剧转变特别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年月，然而他对儒家思想仍然笃信不疑，世界观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交熊知浮俗，儒流不异门”，他一直认为尽管世态炎凉，浮俗多变，然而“儒流”却不应该走入异端邪门，这就是杜甫对“儒”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尽管杜甫“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然而推行儒家路线的大地主阶级却并未重用他。因而他在政治上遭到碰壁之后，往往对“儒”进行贬抑。天宝六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者皆诣京师就选”^①，李林甫压抑贤能，不准一人及第，使得自信非凡的杜甫落得个“朝叩富儿们，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可怜处境。在此情况下，他发出了“纨裤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慨叹，为自己和儒生们的不被重用大鸣不平。此后，一直客居长安，虽然多次求人引荐，然而始终没有效果。因此当他看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酒肉，广文先生饭不足”，世家大族高官厚禄，享乐奢侈，而郑虔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却遭到冷遇，甚至连饭碗也成了问题，再联想自己“杜陵野客入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的可怜境地，不禁大叫大嚷“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对自己学得了儒术未能得到好处牢骚满腹，对他心目中“德尊一代”的孔丘死后居然同柳下跖一样被化为尘埃愤愤不平。这里杜甫虽然直呼了孔丘姓名，然而并不能就此断定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因为就在这一首诗中，杜甫也有“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的句子，认为羲皇、屈宋也和孔丘一样，虽然“德尊一代”，“名垂万古”，然而也没有用，同样化为尘埃了。对于这一点，就连明人王嗣奭也看到了。他说：“此诗总属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辞，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谓儒术可废，亦非真欲孔跖齐观，非真欲同寻醉乡也”^②。其实，就在杜甫大发牢骚的时候，还是到处钻营乞求，希图得到大地主阶级的重用。“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

津”，我们这些儒都快要饿死了，请快快转告给丞相杨国忠吧（平津是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的封号，此处借指杨国忠）！他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推行儒家路线的世家大族身上。可见政治上的碰壁，在杜甫心目中不过是和屈宋孔丘一样所经历的“坎坷”而已，并没有动摇他“奉儒”的决心。

杜甫是一个功名欲望十分强烈的人，虽然在仕途上连连失败，但并不死心。因此，每当他要求别人引荐或看到别人当上官的时候，又总是对“儒”抱有希望，因而又把“儒”捧得高高的。他为了求得玄宗女婿张垪的引荐，一面吹捧张垪“相门清议众，儒术大名齐”；一面又自轻自贱“顾深惭锻炼，材小辱提携”。当他听到沈佺期的儿子沈东美得官的消息后，马上写诗去叙通家之谊，并吹捧他“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的高贵出身，其实亦不过是自我表白罢了。玄宗封西岳华山的时候，那些“醇儒硕生”和“鸿生巨儒之徒”能够“诵古史引时议”，杜甫对此羡慕不已，大加赞扬。而且对于当时宰相兼司空的杨国忠特别进行恭维，“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卑躬屈膝无以复加。他曾先后多次赠诗吹捧郑审和李子芳，要他们“恳谏留匡鼎，诸儒引伏虔”，俨然自比汉朝的儒生匡鼎、伏虔，要郑李二人进行引荐。后来他从江陵移居公安，还特地写诗恭维当时做江陵少尹的郑审为“老儒”。由此可见，杜甫强烈的功名欲望正是建立在对儒学的虔诚信仰上的；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又不断地刺激着他的功名欲望。尽管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和劳动人民有所接触，对大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有所认识，在他的世界观中，产生了一些冲破儒家思想束缚的进步成分，然而杜甫身居下层，眼望上层，始终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藩篱。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那些从军入武，应募出征的武士提供了立功升官的机会。面对这种“王室比多艰，高官多武臣”情况，杜甫不免又为“儒”惋惜哀叹。诸如“天下尚未平，男儿胜腐儒”，“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等等。但是哀叹毕竟只是哀叹罢了，他不但自己“驰驱厌甲兵”，从来没有弃儒投军的打算，而且在《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县防御判官》一诗中写道：“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邱！中原正格斗，后会何缘由。百年赋命定，岂料沉自浮”，对其他“儒士”上前线也充满了哀悼悲伤之情，认为不仅后会难期，而且生命的沉浮也难以预料，只好任随“命定”即上帝的安排罢了。这和他青年时期“自断此生休问天”的豪言壮语相比，真是判若两人。这就难怪杜甫宁愿过着“儒衣山鸟怪”，“百年粗粝腐儒餐”的贫窘流浪生活，也不愿放弃儒的“素业”了。不难看出，杜甫在“安史之乱”的社会大变动中，一方面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产生了某些冲破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但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加深与巩固自己世界观中早已具备的某些儒家思想。

此外，杜甫对于那些儒家之徒总是尊敬的，对于具有法家思想的人总是贬斥的。房琯鼓吹分封诸王，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平时“虚言浮诞，……挟党背公，……高谈有余而不切事”，在指挥唐军向安禄山反击的战斗中，重用儒生李揖、刘秩，用儒家蠶猪式的“春秋车战之法”^⑩，结果被敌人纵火焚烧，一败于陈陶，再败于青阪，伤亡极为惨重。对于这样一个专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儒生，杜甫却颠倒备至，吹捧他“晚为醇儒，有大臣体”。为了疏救房琯，杜甫直言苦谏，不惜丢官坐牢。房琯死后，灵柩归葬东都，杜甫

又是做诗，又是写祭文，真是虔诚得无以复加了。但对于曾和他一起游梁宋齐鲁，有过深厚友谊的李白，虽然也多次写诗表示怀念哀惋，然而“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也仅仅可怜他的才能，并没有为李白伸冤辩屈，甚至认为李白“佯狂”装疯，犯了大罪，只是应该杀而可以不杀罢了。这与杜甫对儒生房琯的态度相比，真是泾渭分明了。有比较才能鉴别。杜甫对房琯和李白的不同态度，正好说明了他对于儒家路线有着一种本能的不可割断的联系，而对于法家营垒则有着一一条难于跨越的鸿沟。

总之，杜甫笔下的“儒”，无论褒贬抑扬，始终没有离开“奉儒守官”这个根本和“素业”。褒扬是为了把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抬得更高；贬抑是为了替儒术不被重用喊冤叫屈，是为了更有效的褒扬。所谓“洗眼看轻薄，虚怀任屈伸”，就是要用儒家“以屈求伸”的办法达到“致君尧舜”的政治目的。

毛主席指出，我们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今天，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剖析杜甫的政治倾向，把他世界观中冲破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与严重的儒家思想区别开来，做到古为今用，对于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有助益的。

注：

- ①《赠韦左丞文二十二韵》，见《杜诗镜铨》卷一。本文所引杜甫诗文均见《杜诗镜铨》，以下不再注出处。
- ②《新唐书·刘晏传》
- ③《东坡集》卷二十四。
- ④《资治通鉴》，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一二四页。
- ⑤方东树：《昭昧詹言》。
- ⑥见《杜诗镜铨》卷十二《三绝句》，这两句诗有同志认为是军阀混战，互相残杀。根据杜诗旧注：“天宝乱后，蜀中山贼塞路，渝开之事，史不及书，而杜诗载之”，再联系同一时期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等诗中对农民起义的态度，我认为这两句应是写“山贼”即山民起义的。
- ⑦元结：《谕友》。
- ⑧见《杜诗镜铨》卷二《醉时歌》仇注引王嗣爽语。
- ⑨《新唐书·房琯传》。